

中華佛學學報第 6 期 (p263-278) (頁數)：(民國 82 年)，臺北：中華  
佛學研究所 (發行單位)，<http://www.chibs.edu.tw>  
Chung-Hwa Buddhist Journal, No. 06, (1993)  
Taipei: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ISSN: 1017-7132

## 胡適與印度友人師覺月

冉雲華  
馬克馬斯特大學名譽教授

p. 263

### 提要

本文介紹一份歷史性的佛經卷子，經文為五代時吳越國王錢俶敕刻印刷，本世紀初出土於杭州雷峰塔；卷子的跋文，為中央研究院故院長胡適手書。世界二次大戰之後，印度政府派遣其著名學者師覺月到北京大學任講座教授，胡氏斯時適任北大校長。師氏任滿返國之前，胡氏以此卷相贈，為師氏家藏文物。此後世局多變，人事滄桑，此一歷史文物及其所代表之友誼，亦鮮為世人所知，今將原卷影印出版，並將二氏對印度佛教文化研究的豐績，加以評述，希望對研究佛學，中印關係及胡氏研究者，提供一份珍貴史料。

**關鍵詞：**1.胡適與禪學研究 2.師覺月與中印文化交流

附錄：①師覺月博士著作目錄②胡適所贈卷子及題跋照片

胡適先生（1891～1962）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知識份子的重要領袖之一，著作甚多為國際學界所重視。他以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的語言、文學、思想、宗教、歷史等開風氣之先，是中國科研在人文科學方面的奠基人。但是一般研究胡氏的人，多集中於他的主要工作：白話文學的提倡、新詩的嘗試、小說史的探究、古代哲學歷史的撰述、禪宗歷史與文獻的整理、水經研究、戴震（1724～1777）等清儒的評論。凡此種種，自是胡氏學的主要方面，無可爭議。但有一點值得注意，即胡氏的學術興趣，範圍頗大；來往交遊，人數甚多，幅面亦廣。因此之故，胡氏的治學及交遊，或有一些事蹟，為研究胡氏的學者，尙未注意，亦為《年譜》所未載。例如胡氏對印度的興趣，及其與印度友人師覺月的交誼，據筆者所見，還沒有受到研究胡氏者所注意。

本文將討論三件事：一、胡適對印度的研究，二、師覺月其人其事，三、胡氏贈師覺月的古刊佛經印本及題跋。希望這些事件的討論，對胡先生的事跡、學問，及近代中國與印度的關係史，能有一些補充。

## 一、胡適對印度的研究

正像與胡氏同時代的大部份學者相似，胡氏對印度學的興趣，也是從佛學開始的。早在 1925 年時，胡氏發表了〈從譯本裡研究佛教的禪法〉。他從漢文翻譯的印度佛經理，摘出有關禪定的資料，寫成此文，把印度佛家禪定的特點與發展，作了系統的分析與介紹。這篇文章用今日佛學研究的水準來看，仍然值得參考；在發表的當時，它無疑的是一篇水準甚高的學術論著。

1925 年，胡氏還發表了一篇英文論文，題為

"Buddhist Influence on Chinese Religious Life"（意為〈佛教對中國宗教生活的影響〉）。在他的看法中，佛教是從印度傳入中國的外來思想，對中國人的宗教生活，曾經產生過重大與多方面的影響。這篇論文用的是比較文化研究方法，主題是印度與中國宗教生活的對比，以及對中國文化所產生的後果。

1928 年，胡氏發表了兩篇論文：一為〈禪學古史考〉，一為〈論禪宗史的綱領〉。這兩篇論文，雖然是討論中國禪宗的發展，但是其古史與禪

法方面，仍然涉及到印度傳統。胡氏在這一方面的研究，對其後來的禪宗史研究，及敦煌禪宗卷子的整理，如《神會和尚遺集》，都有重要的關係。上述的胡氏早期中文學術論文，在《胡適文存》第三集，後來又被編入《胡適禪學案》一書中。

1932年，胡氏發表了他的英文論文：

"Development of Zen Buddhism in China" (意為〈禪在中國的發展〉)。

此文印出以後，馬上受到國際學者的重視，成為研究禪宗思想、歷史、方法學者必讀論文之一。這篇論文，原刊於北平出版的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Review**，第十五卷第四期。師覺月在北大執教時，胡氏贈送該文抽印本一份，

p. 265

師氏讀之，甚為欣賞。後來回到印度，又將此文再刊於師氏自己主編的**The Sino-Indian Studies**。因此一舉，該文流傳更廣，影響亦巨。

胡氏的另一篇英文名著，題為"The Indianization of China :

A Case Study of Cultural Borrowing"，收於美國哈佛大學 1937 年出版的一本專著中。那本專著，名

為 Independence, Convergence and Borrowing in Institutions, Thought

and Art (《制度、思想與藝術的獨立、和會與借用》)。胡氏在這一篇論文中，著重指出印度的消極人生觀，曾對中國人的宗教態度，產生過負面的影響。他的這種看法，雖然在今天的學術氣氛中，不能被許多專家所認同，但仍足以代表一家之言。因此當研究中國人的宗教態度時，此文到現在還是重要的讀物之一，極有參考價值。

1950年時，日本的禪學權威鈴木大拙，用英文出版了一本書，名書

**Living by Zen** (《依禪生活》)，認為禪的境界，超越人的認識能力，是直覺的頓悟，當下進入悟境，非言語所可表，亦非知識所可知。禪的境界既如此高深莫測，其修道的方法自然也成為無修之修。其境界既不

可能以言詮義表，禪的方法更無定規，所以禪宗語錄就有「不說一字」、「無法可得」等說法。

胡先生的思想是非常理性的，他對中國禪宗史有深度的研究，也有全面的理解。再加上他是局外人，立場比較客觀。在他看到鈴木先生的大作之後，寫成一篇英文論文，題為"Ch'an (Zen)

**Buddhism in China : Its History and Method"**，刊於夏威夷大學出版的

《東西哲學》季刊第三期。胡氏的這篇文章，是他 1932 年那篇討論禪學英文論文的延伸，也是胡氏研究禪學思想的代表作品。他在這篇論文中，駁斥鈴木的說法，認為禪的境界是可知的，悟的成就是有法可修。雖然中國古代的一些禪師，反對刻板式的修道法門，甚至還用過如棒喝一類的激烈手段，或用「麻三斤」、「乾屎橛」等髒字；但這並不足以表示禪師們沒有修道的方法，因為他們的所說所為，正是一種新的法門。這些新型的方法，雖然與印度傳來的禪法不同，但是仍然是一種來自中國傳統的辦法。在這種狀況下，想要理解禪的境界與方法，不應只向印度文化去尋根，或是專門強調個別修禪者的經驗；而是應當認為禪是中國文化的一部份，要從中國傳統的歷史、思想、表達思惟方式的習慣中去理解。

鈴木先生是介紹禪法到西方世界的開拓人，又是日本臨濟宗的高僧。他精通英、中、梵、藏等學術語言，博學而有宗教體驗，在國際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東西哲學》的編者在得到胡氏論文之後，先寄一份給鈴木，並希望他能為文答辯。鈴木果然寫了一篇題為"A Replay to Hu Shih"

（〈答胡適書〉），刊於同一學報。這次中、日禪學名家大爭辯，是當時國際學術界的一件大事，受到廣泛的注意。胡氏與鈴木各持己見，各有所據，各有讀者，到現在還是禪學界繼續討論的課題。例如德國學者杜莫林教授，在其鉅著《禪宗史》中，就以那次論爭為開首而作序論。胡氏與鈴木的相反看法，

p. 266

足以反映歷史與宗教的觀點分歧，方法差異。從他們兩人的辯論中，讀者還可以觀察到印度、中國、中日文化的觀點不同。

在中國近代學者中，胡先生自然不能算是一位印度學的專家。與他同時的學者如梁漱溟、湯用彤；較後的如季羨林、金克木等，都以印度文化

為專題著書立說，翻譯介紹；但如從禪宗的歷史、思想、文獻及比較文化上著眼，胡氏的工作則遠超過其他的學者。

## 二、師覺月其人其事

胡氏有一位印度友人名叫師覺月。師覺月的印度原名叫 Prabodh Chandra Bagchi。因為他姓 Bagchi 是婆羅門階級，以教化人民為職責，所以自氏其漢姓為「師」、「覺月」二字，是 Prabhodh Chandra 兩個梵字的意譯，他就以此為中文名字。他生於 1898 年，逝於 1956 年印度國立國際大學副校長任內。

師覺月博士生於印度孟加拉州。1921 年從加爾各答大學取得碩士學位。當時東印度有兩所著名大學：一為英印政府官辦的加爾各答大學，因受官方支持，經費充足，師資甚佳。但是因為是官辦，而且有英國紳士派頭，看不起本地人士。另一所則為泰戈爾父子所創辦的國際大學，當時雖然還是私立，可是思想活潑，崇尚自然，提倡印度古典文化，主張重視亞洲傳統。尤其是在羅賓德拉·泰戈爾（1861~1941）於 1913 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金之後，聲名大振，詩名揚於環球。他當時請到法國著名的東方學家賽·列維，到國際大學講學。列維教授專家於印度佛學，精通梵、漢、藏等佛教語言，治學以嚴緊聞名於世。泰戈爾請列維在國際大學開創中文教授。加爾各答大學選派師覺月到國際大學，從列維學習中文及佛學。不久又隨列氏到尼泊爾考察佛教典籍，並助其師校讀佛經，理會經義。1922 年師氏得到加爾各答大學的一種遊學研究獎金，隨列維到巴黎去深造。又得乃師的推薦，由法國極東學院資助，到日本訪問研究。1923 至 1926 年間，他在法國攻讀博士學位。從列維鑽研梵典，從伯希和研究中亞西亞文化，從馬司伯樂學習漢文佛經，從布洛

（J. Bloch）研究巴利文，從梅列（A.Meillet）學習古波斯詩頌。1926 年 6 月，師覺月獲得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回到加大研究院，復任講師職務。1929 年，第二次到尼泊爾，蒐集佛教梵文典籍。

從 1927 年起，師覺月的學術著作，陸續出版。其中最先刊出的是他的博士論文：《中國佛教經典考》，上下兩巨冊。他的這部書中，將中國佛教歷代目錄，按照譯者逐其時代列出，加以綜合研究。書中對每位翻譯家的傳記，及其所譯經典的梵名、漢字拼音、卷數，所記目錄等，逐項記出。因為一般書目，如《大正新修大藏經總目錄》，只記現存經典，

而佚散佛書則散記於古代各家目錄；師氏此書的綜合研究成果；直到今天還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p. 267

又因他梵文甚佳，又熟知古代印度文化，故其對漢文所譯印度名詞，訂正甚多。他的這部研究也是近代印度學者第一部以漢文資料為主的專著。

他對太古印度文化的研究，可以從其《德文迪亞及亞利安語以前之印度》看出。又從藏文中找到古孟加拉文佚經，並且進一步考察了早期孟加拉語文的特點與歷史。又著《密教研究》一書，也對密教中的許多新問題，有開創性的討論。

1944年，他出版了《印度與中國--千年文化交誼史》，對中印友好歷史作了回顧。此書雖然篇幅不太長，但仍然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又著《印度與中亞細亞》，一書，討論印度，特別是佛教文化對中亞的影響。此書出版於1955年，現在閱讀稍顯過時，但對當時的印度學術界而言，已是全新學術領域的延伸。

總括師覺月的學術研究有三個方面：佛教典籍與歷史、古代印度文化，及早期孟加拉語言與文學。在佛教研究方面，他所研究的科題，包括中文佛典研究，印度佛教傳統及密教問題等。他的佛教史研究，也涉及到印度與西亞及中國的關係。他在這些方面的貢獻，贏得了印度及國際學術界的重視與尊敬。曾被聘為多種學術團體的委員、主席等職；並被邀請作主題演說多次。

國際大學的中國學院，是泰戈爾在國人譚雲山教授協助下成立的。抗日戰爭期間，印度支持中國反對日本侵華，是亞洲政治動向的一轉折點，而這一歷史轉折—印度由敬重日本到支持中國—的幕後推動者，正是譚雲山先生。後來戴季陶、太虛，乃至當時的蔣委員長伉儷等訪問印度，都由譚先生作事前安排，參與接待。蔣氏為了重視印度，故於抗戰前後，數次撥款，支持國際大學。譚氏在這種情形下，決定擴建中國學院，廣延印度學者，加強中、印文化交流。1945年由中國學院延聘的教授，就有師覺月、巴帕特（P.V. Bapat）、高克力（V.V. Gokhale）等人。其中師覺月主持研究工作。由於這種關係，師覺月後來被派到北京大學，成為北大的講座教授，而胡適當時正好是北大校長。

抗戰勝利以後，中國以盟國五強之一進入世界舞台，印度國大黨在反抗英國政府，爭求獨立的運動已進入最後時期，勝利在望。快要獨立的印度領袖人物，從甘地到尼赫魯，都有意加強與中國的友誼，作為反抗英國在印度統治的外援。而當時的國民政府亦決定擔當亞洲領袖的重任，協助印度獨立，推展中印友誼。詩人泰戈爾的亞洲文化合流理想，斯時變成事實。

在國民政府與印度國大黨的合作項目中，有一項是兩國交換教授及留學生。由中國派遣一位教授到印度講授漢學，由印度也派一位專家到中國去傳授印度學；雙方各派十名研究生，到中、印兩國交換研究。中國政府決定，任命譚雲山先生為第一任講座教授，於國際大學中國學院講授中國文化。師覺月博士則於 1947 年，由印度政府派往中國，

p. 268

於北京大學出任印度文化講座教授。一直工作到 1948 年底，任滿回國。

### 三、胡適贈師覺月的古刊佛經印本及題跋

作為當時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在師覺月任滿返回印度時，送給印度友人一幅橫卷作為留念。那份卷子是五代時吳越國王所刻的佛經印本；胡氏並在一幅宣紙上，親筆題跋，與佛經印本，合裱成一個橫長卷子。胡氏的跋文用他所提倡的白話文寫成，筆墨流暢，字跡謹秀。1956 年師覺月博士以心臟病猝逝，次年春天筆者與師老師的得意學生——好友沙善子（Kalyan Kumar Sarkar），協助其家人整理遺物時，發現此卷。並由筆者用相機攝影，留下此一文物的照相本，至今又已近四十年了。胡先生的跋文，現在依原卷的字數行數抄出如下：（括號中的數字，記戴跋文行數，是筆者所加）

大學設立一個印度學  
術的講座，第一任教  
授就是師覺月博士  
他在北大的工作是給中  
印友誼與學術合作  
建立了一個有力量的  
基礎。現在他要回國  
了，我們都很惜別。  
我把這一卷最可以紀念  
中、印文化關係的中國早  
期刻經送給他，祝他一  
路平安

胡適 (印章)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大學設立一個印度學  
術的講座，第一任教  
授就是師覺月博士  
他在北大的工作是給中  
印友誼與學術合作  
建立了一個有力量的  
基礎。現在他要回國  
了，我們都很惜別。  
我把這一卷最可以紀念  
中印文化關係的中國早  
期刻經送給他，祝他一  
路平安。

胡適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此經為唐  
摩訶薩婆無量壽國寶光明  
佛中興大菩薩系及大解  
開僧天龍等又使開度阿  
耨羅地極難應難摩羅  
羅伽人非人等無量百千  
衆供前復開通令時教中  
有一大寶羅門名無垢妙  
光多開諸人所得是常  
奉十善於三寶中決身信  
向善心殷重智慧微妙常  
欲令一切眾生相慶善利  
大富豐饒實其開滿時彼  
渡羅門顯現妙光授座而  
起往詣佛所禮拜七匝以  
取香花奉獻世尊無價妙  
衣瓔珞珠鬘持鬘鬘上頂  
禮雙足却住一而作是請  
言唯願世尊與諸大衆明  
目長朝至我宅宇受我供  
養奉時世尊默然許之  
後羅門知佛受請遠遊所  
往即於是夜成辦歸摩百  
求伏念美及

胡氏贈送給師覺月的「中國早期刻經」印本，就是著名的《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俗稱《寶篋印陀羅尼經》。此經為唐



代僧人不空三藏所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九冊中，收有二個版本：一為高麗藏所傳；一為日本享和元年刊本。卷子本與高麗藏本相同，日本刻本常有刪略。

卷子所裱的刻本前有杭州西湖的雷峰塔圖一幅，這是筆者所見中國最早的佛教名勝風景刻本。圖後有題款三行，文曰：

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

造此經八萬四千卷捨入西關

塔永充供養乙亥八月日紀

按《五代史》及《吳越備史》等記載，乙亥年是公元 975 年，即北宋開寶八年。當時錢王的頭銜確是「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另一方面，錢氏那年尚未歸順趙宋，所以未用宋朝的開寶年號。吳越王國自己也不建紀年，故用乙亥紀年。

這三行題款的後面，又是一幅圖畫。畫中有佛、菩薩三身，受人供養；又有一菩薩，頭上頂有舍利塔一座；前有供養婦人跪拜。這正是刻經造塔的主題。據說錢俶有妃姓黃，信仰佛法，得佛陀螺髻髮舍利，發願起塔供奉。錢王是奉佛聞名，又愛黃妃，所以資助其事，以償心願，並造八萬四千卷，藏於塔中。這份《寶篋經》，專門稱贊供養一切如來全身舍利的功德，經中明言凡是書寫、誦讀、塔藏、禮拜此經者，就可以滅罪興福。這就是此書、此塔建造的經過和目的。可是由於民間傳說和戲曲的影響，雷峰塔是被一般人看作鎮壓白蛇的地方。這一民間傳說的影響，使得由蛇變人、神通廣大的白娘娘也成為爭議的象徵：老派人說她是妖精，新派人士則把他視為追求愛情自由的代表。民國 14 年雷峰塔忽然倒塔，塔中遺物之一的這份五代佛經印本，才為人們所發現。刻本字跡清細方正，頗有古代寫卷的風格。甚受士林重視。師覺月是來自天竺古國的佛教經籍專家，胡適以此古刻經卷相贈，可謂寶劍英雄，經卷學士，兩相得宜。這一事件，也成為中、印近代學術合作的一件盛事。可惜人故物遠，此物此事現在幾乎不為人知。

1948 年胡氏題此卷跋時，中國正是多事之秋。國共兩黨內戰正烈，打打談談，談談打打。作為知識界領袖代表人物之一的胡氏，正處於左右抗爭的夾縫之中，而北大正是學運、國是、政治、思想的風暴中心。胡氏當時身為北大校長，然可用於學術交流的時間，應不太多。但他仍然忙中擠出時間，拿出此卷，親筆題辭贈友，也足以顯示出他對師覺月博士的尊重，以及對中、印學術合作的重視。

師覺月在北大的一年多，與其來往頗密的中國友人，有吳曉鈴、石素貞夫婦。還有周一良、

p. 270

王森田、周達甫及德籍李華德等教授。這些人士正是北京學界當時致力於印度學或佛學的活動人士。

吳、石兩位當時都在北大執教。早年留學印度就與師覺月相熟。吳是著名語言學家羅常培先生的高足，曾將梵文劇本《小坭車》等，譯為中文。又與相聲名家侯寶林先生，合作研究相聲藝術。前數年曾以對中外文學研究有貢獻，獲得法國、印度兩所著名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他的夫人石女士，專攻現代孟加拉文學，曾經把泰戈爾的詩歌、小說、散文，譯成中文。譯筆忠實而流暢，被認為是冰心、鄭振鐸以後，中國新生代翻譯泰戈爾作品的專家。師覺月在北京時，與他們來往甚密。

燕大歷史系的教授周一良，當時才由美國哈佛大學回國不久。他在哈佛的博士論文，正是《中國的密教》。論文對介紹佛教密宗入華的三位天竺法師，即被尊為「開元三大士」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人的傳記，譯為英文，廣加註釋，詳為考證，並評估其歷史貢獻。這篇論文曾為國際佛學界所重視，亦為師氏所稱許。除開密教之外，周與師氏兩人，都對南北朝的社會文化史有興趣，志同道合，成為好友。

周達甫博士就是近年大陸民運領袖之一，周舵的父親。抗戰前後留學印度，在孟買大學取得哲學博士；也是師覺月在印度就相識的老朋友。他們兩位曾經在國際大學合作研究，寫成英文論文：〈菩提伽耶的宋代中文碑銘考〉。這是研究中印文化中的一篇重要論文，刊於《中印研究》第一卷第二號。

王森又名王森田，是一位真才實學的佛學專家。通漢、藏、梵、英等佛典，當時北京的外國佛教學者，有許多都曾得到王先生的助力。五十年代以後，在民族學院工作，專心致力於藏文研究。前幾年病逝於北京，也是師覺月當年的友人之一。

德籍佛學專家李華德博士，原名 **Walter Liebenthal**，原在北平輔仁、燕京大學教授梵文。抗戰期間曾隨校南遷雲南，曾將中文佛籍名著《肇論》，譯為英文，在北京出版，後來又在香港印刷第二版。此書之譯成，得王森教授之助甚多。師氏在北平時，與李華德相識。後來大陸大學重

新編制，李氏被刷了下來。而師覺月當時已昇任國際大學研究院院長；並於 1952 年入印度文化訪華代表團，訪問大陸。於是邀請李華德到國際大學，作研究教授。李氏在印度居留數載，寫成佛學論文多篇，其中研究竺道生者有四篇，刊於《日本文化學報》( *Monumenta Nipponica* )；討論《大乘起信論》作者一文，在《通報》中刊印。這些論著，頗為學術界所重視。

師覺月在北大授課時，曾發表英文論文一篇，題為〈中文古籍中的印度古名考〉。此文發表於北平出版的外文學報，《華裔學誌》第十三卷，是一篇研究中、印古代關係的重要論文。《華裔學誌》是德國學者主編的漢學學報，師氏這篇論文的刊載，或許是由李華德所介紹。李氏後來返回德國，怡養天年。

1993 年 3 月中旬於台北寓中

p. 271

p. 272

附錄一

## **A Bibliography of Dr. P. C. Bagchi's**

Works

India and China:

Greater India Society Bulletin 2, Calcutta. 1927-pp.42.

Le Canon Bouddhique en Chine les Traducteurs et les Traductions:

Tome I, pp. lii, 436. 1927. Tome II. pp, vi, 437-742.

1938. Sino-Indica Publications del'Universite de Calcutta.

Deux Lexiques Sanskrit-Chinois: Fan Yu Tsa Ming De Li Yen et Fan Y

u Ts'ien Tseu WenDe Yi- Tsing.

Tome I, pp. iv, 336. 1929. Tome II. pp, viii, 337-540.

1937. Sino-Indica Publications del'Universite de Calcutta.

Kaula-Jnana-Nirnaya and Some Minor Texts of the School of Matsye

ndranatha ———

Calcutta Sanskrit series, Metropolitan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House,

Calcutta, 1934, pp. viii, 92,

148. Critical edition of Sanskrit texts discovered in Nepal in 1921 and 1

929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dhyatma-Ramayana

Reprinted from Adhyatma-Ramayanam in the Calcutta Sanskrit series

, Metropolitan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house, Calcutta. 1935 ? pp. 78.

Dohakosa with Notes and Translations——

Reprinted from the Journal of the Department of Letters, Vol. X X VIII,  
Calcutta University. 1935. pp. viii, 180.

Dohakosa (Apabhramsa Texts of the Sahajayana School).

Part I, Texts and commentaries. Calcutta Sanskrit series, Metropolitan  
Printing andPublishing House, Calcutta, 1938. pp. viii, 167.

Materials for 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Old Bengali Caryapadas (a comp  
arative study of the text and the tibetan translation).

Part I. Reprinted from the Journal of the Department of Letters, Vol. X  
XX, CalcuttaUniversity. 1938 pp. X, 156.

Studies in the Tantras

Part I Calcutta University. 1939. pp. viii 114.

India and China, A Thousand Years of Sino-Indian Cultural Contact.

China Press. Calcutta. April,

1944. Second Edition, Hind Kitabs, Bombay.1950. pp. viii, 234.

Discourses on Buddhism.

Reprinted from the Visva-Bharati Quarterly, February-April,

1949. Visva-Bharati. pp.16. Lectures delivered in Peking.

India and Central Asia.

L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Education, Bengal, during

1949-51 as the Hemchandra Basu Mallik Professor of Indian History.

pp. viii, 184. National Council of Education, Jadavpur, Calcutta, 1955.

Pre-Aryan and Pre-Dravidian in India.

(Translation of Articles of Prof. Sylvain Levi, Jean Przyluski and Jules

Bloch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Calcutta University, 1929.

Bharat O Indschin:

publisher-sri kundalehusan Bhaduri, P. I,

104. Reprinted in Visva-vidya-saingraha, Bhādra, 1357, Visva-Bharati.

Contributions to Commemoration and Presentation Volumes:

B. C. Law Volume Part I:

"The story of Dhanika, the Potter's son as told in the Different Vinayas

". Bharata Kaumudi, presented to R.K. Mukherjee, Part I 1945, Luckno

w:

"The Island of K'un-Lun and Chandradvipa." Sardesai Commemorative Volume 1938:

"The Rashtrapala Nataka of Asvaghosha." K.B. Pathak Commemorative Vol. Poona, 1934:

"Sangharaksha, the chaplain of Kanishka." Sir Ashutosh Mukherji Silver Jubilee Volume, Vol. III Part 2 Orientalia:

"Decline of Buddhism in India and its causes." Sir Ashutosh Mukherji Silver Jubilee volume, Vol. III Part III Orientalia 1927:

"The Historical Beginnings of Jainism."

Contributions to Conferences:

Symposium on History of Science in South Asia, Delhi, November, 1950; Indian Sciences in the Far East. Presidential Address, Indian History Congress, Section I,

1943: On the Role of the Central Asian Nomads in the History of India (Journal of the Greater India Society, Vol.X, No.2 July 1943).

Presidential Address, All India Oriental Conference, 1946, Section: Pali and Buddhism (Proceedings).

Contributions to Journals:

Journal of the Greater India Society Vol.10, No.1, January 1943:

Twelve Years of the Wandering Life of Buddha.

Sino-Indian Studies.

The Beginnings of Buddhism in China (Vol I Part I). Vajragarbhatantra  
rajasutra — A new work of King Indrabodhi (Vol I Part I). Chinese Coin  
s from Tanjore (Vol I Part I). Sino-Indian Relations—the period of the U  
nited Empires (I) (618-1100 A. D.)

(Vol. I Part II). New Light on the Chinese Inscriptions of Bodhgaya (Jo  
intly with Chou Ta-fu)

(Vol. I Part II) Bodhisattva-sila of Subhakarasinha (Vol. I Part III). Sino-  
Indian Relations—the Period of the United Empires (II)

(Vol. I Part IV). Ki-Pin and Kashmir (Vol. I Part I). Ptolemy, the Niddesa  
and Brhatkatha, translation of the article of Sylvain Levi from the Etud  
es Asiatiques, Vol. II (Vol. II Part II). On the original Buddhism, its cano  
n and language (Vol. n Parts 3 &

4). Chang so che lun (Jneya-prakasa-sastra)-an Abhidharma work of  
Saskya-Pandita of Tibet (Vol. II Parts 3 &

4). The Geographical Catalogue of the Yaksas in the Mahamayuri (Vol



. III Parts I & II). Report on a New Hoard of Chinese Coins (Vol. IV Parts 3 & 4).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The Sandhabhasa and Sandhavaçana (1930); Bodhicitta-vivarana of Nagarjuna (1931); On the antiquity of the name "Kasthamandapa" (1931). Some Linguistic Notes (1933); The Seventh All-India Oriental Conference (1933); Kuchean or Western Arsi (1934); Sylvain Levi (1936); The Eight Great Caityas and their Cult (1941); A New Source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Kamarupa (1942); Ba'urah or Baruza ?

p. 274b

(1943); Krimisa and Demetrius (1946).

Calcutta Review.

Some Early Buddhist Missionaries of Persia in China (July, 1927); Abel Bergaigne and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Vedas (1931); The Chinese Mysticism (1933); Victor Jacquemont in India (1933).

Visva-Bharati Annals.

A Note on the Avadanasataka and its Chinese Translations (Vol. I 1945);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Bengal and China in the Pathan Period (Vol. I 1945).

Journal of the Indian Society of Oriental Art:

A Painted Nepalese Banner (1933) Brahmamayamala-Tantra, ch. IV — A  
New Text on Pratimalaksana (Vol. III 1935) Some Brahmanical Miniatures  
from Nepal (Vol. VIII 1940) A Nepalese Pata of the Sudhanakumaravadana  
(Vol. VIII 1940). On the Canons of Image-making Pingalamba, ch. IV (Vol. IX 1943).

Indian Culture:

New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Kumaratantra of Ravana (Vol. VII).

A Fragment of the Kasyapa-samhita in Chinese (Vol. IX).

Journal of the Department of Letters:

Primitive Elements of Jainism (Vol. V 1921) The Legend of Buddhaghosa  
by Louis Finot, translated by Dr. P.c. Bagchi (Vol. XI.

1924). On the Purvas (Vol. XIV 1927) Sulika, Culika and Culika-Paisaci  
(Vol. XXI 1931).

Visva- Bharati Quarterly:

Early Medieval Mysticism and Kabir (1945). Castes of Indian Mystics (1946).  
Discourses on Buddhism (Peiping Lectures) (Vol. XIV. No. 4).

Calcutta Oriental Journal:

A Note on the Language of the Buddhist Dohas (Vol. I 1934) Some As

pects of BuddhistMysticism in the Caryapadas (Vol. I 1934).

Epigraphia Indica:

A Note on the Pratitya Samutpada Sutra (Vol. XXI No. 33).

Indian Linguistics:

The Sibilants in the Buddhist Dohas (Vol. V 1935).

Journal of the Bihar Research Society:

Indian Culture in Central Asia (Vol. XXXII, Part I 1946).

Journal of the UP. History Society:

Some Letters of Hiuan-Tsang and his Indian Friends (Vol. XVIII, Parts  
I & II).

Monumenta Serica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Ancient Chinese Names of India (Vol. XIII, 1948).

The Modern Knowledge (Chinese Magazine Published from Peking):

(Translated by Mr. Wu Hsiao-Ling) Introduction to India and China (Vo  
l. I No.3 1947).

Explanation of the Worldly Life (Chinese Magazine Published from Pe  
king):

Place of Buddhism in Indian life (Vol. I No. I 1947) Buddhism and Anci

ent Indian Thought(Vol. I No.2) Buddhism-firstpopular religion (Vol. I N

o.3) Hinayana and Mahayana (Vol. I No.4) Buddhism and Medieval Indian Tantrism (Vol. I No.5).

Liberty: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ovember,

1930) Modern Nepal (September, 1929).

Some Aspects of the Buddhist Mysticism of Bengal—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India Vol. I (Sri Ramakrishna Centenary Memorial).

Indian Influence on Chinese Thought—History of Philosophy, Eastern and Western 1952-53.

Chapter on Religion in the "Age of the Nandas and Mauryas", edited by Prof. N.K. Sastri, 1952.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Eastern Turkestan and China" in A new History of the Indian People Vol. VI,

1946, edited by Dr. R.C. Majumdar and Dr. A.S. Altekar.

Hindusthan Standard, Puja Annual,

1944—Sino-Indian Spheres of Influences.

Hindusthan Standard, Puja Annual 1945—Khotan as a cultural outpost of India.

Bulletin of the Ramakrishna Mission Institute of Culture Vol. III September

ber, 1952 and October, 1952: Foundations of Indian Civilization- I and II.

The Indo-Asian Culture Vol. II No.1, July 1953-Indian Science in the Far East.

Buddhist India:

A Buddhist monk of Nalanda amongst the Western Turks (1928).

Four Arts Annual:

Indian Art and Civilization in Central Asia (1934).

New Asia:

Buddist Studies in Japan and the Taisho Edition of the Chinese Tripitaka (1939).

Chapter on Religion of Bengal in History of Bengal, Vol. I, Dacca University Expansion of Buddhism in India and in Northern Countries—2500 Years of Buddhism, 1956.

Foreword to "Kamasutra of Vatsyayana."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Dr. B.N. Basu, 1954.

Bharat O Madya-Asia:

Bharati Bhaoan, P. IV, 110.

1937? Reprinted in Visva-oidya-samgraha, Asoin, 1357, Visva-Bharati.

## **Dr. Hu Shih<sup>1</sup> and His Indian Friend—Dr. P. C. Bagchi**

Jan Yun-hua

Professor Emeritus, McMaster Universitys

### **Summary**

The paper present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document, a scroll of a 10th century woodblock printed Buddhist scripture with a handwritten colophon by Dr. Hu. It was a gift from Dr. Hu to his Indian friend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ity Peking during the forties of this century. Dr. Hu was then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whileas Bagchi was the chair professor of Indian studies deputed by the Governmet of India. Because of political changes in China during the subsequent decades, the event and the document became obscure to most of scholars. This paper is the first publication on the subject, which should be useful to historians who study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as well as on Hu Shih.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Hu and Bagchi on Buddhist Studies are also reviewed.